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成果要报》

2016年第29期 (总第47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编

2016年08月15日

廓清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差异， 创新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

陈宗胜

【内容简介】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理论界及实际部门广泛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其中实际部门多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理论界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阐明，其中有人认为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也有人认为这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有不同，或者可能有异有同，但是究竟如何异同也没有说明清楚。本文认为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因为二者可能根本不同，二者的基本内容、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以及试图采取的对策都是不同的。弄清这些基本方面的不同点，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助于创新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

首先，包含的理论内容完全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从而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我国政府按“问题导向”方法在新常态环境下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并且从这个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并不一般地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相反总是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进一步说，这一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因此其所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成熟，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没有充分和成熟的社会经济实践，不可能有成熟的系统的相关理论。当然，适应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讨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实践内容，一定能对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有所裨益。

其次，产生的经济背景不同

经济学界熟知，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或者说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地

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此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而另外时间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很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已经成熟和发达的经济背景。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第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比较差别仍然较大。如此基础设施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思路，不可能直接依据成熟经济中的供给学派理论。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是54%稍多，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6%多。但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也为70%多。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是一元经济。一元经济中产生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增长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即以千万计，在这之外还存在4—5%的城

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乡村中大量潜在失业农民。这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第三，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各种经济社会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从而适应社会需要产物，现代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这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一般地说，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并要努力解决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应当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主要差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我国与发达国家GDP的物质财富内容是不一样的，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我国新增产值中物化产品的不配套问题是严重的，不匹配即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只能增加库存量。这就是通常所指的“木桶原理”。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还是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大约为50%，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比较而言，我国在推进结构转换过程中损失更大，这些都是GDP的缩减因素。四是经济增加值中比发达经济包含更多补偿性。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设备坚固耐用，财富日积月累。而我国新生产产值

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的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这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五是我国经济基数及选择性与发达经济不可比。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还很低。与富裕的经济体比较，我国经济基数还太小，因此经济供给品的品种、质量、价格、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就低，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必然较小。面对如此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只能以总量增长为目标，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第四，开出的治世药方和政策措施迥然不同

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源泉，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因此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推行货币超发，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特别是减低边际税率应当作为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于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

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而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因此，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增加投资，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从而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以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那么供给侧的问题即可解决，经济即可保持稳定增长。毫无疑问，通过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我们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

陈宗胜，中国特色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前副秘书长。

